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柳州钟表业

许待安

（一）柳州市钟表行业发展变化的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在柳州市（过去称为柳江县）没有完整的一家专业性的钟表店，只有在培新路有一家均和百货店(现在饮食公司办公大楼)，兼营钟表摆卖手表、挂表不多，只在柜台行列里摆一角。另外在驾鹤东路有一家叫天大的修理钟表店（现在大桥左边食品公司驾鹤门市部），它是一家修理钟表和单车，兼卖一点旧钟表，老板是邓荣芳，一家人有的修钟表，有的修单车，也不是专业性的。

抗日战争以后，我父许有恒与友人合伙在上海租用亨达利钟表店招牌，来广西梧州经营钟表眼镜店，合伙资金共二万多元，上海股东占大股(占总资金约五分之四)，当时组织的形式是经理周伦镛、副理许有恒、协理周庆棠，帐房（会计）由上海股东派下来。店内经营权经理是名誉上的，实际是由许有恒全权负责，协理周庆棠协助经理管理好企业，责任是对上海股东负责。

（紧接上页）家老小四口有幸碰见了在铁路工作的同乡，帮我们挤上了铁路员工家属疏散车逃出柳州。以上记述是凭个人回忆，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在所难免，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和补充。（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梧州享达利钟表店于1937年8月左右在梧州大南路正式营业。经营钟、表、眼镜、表带，兼营修理钟表，是一个完整的钟表专业店。开业以后，顾客盈门，热闹非凡）每月营业额很高。但梧州是讲广东话的，店内除一个职工吴正才会讲广东话以外，其余十多个职工都是上海人，不会讲广东的话。为了要做生意，后来请了一个同乡胡承典（他是 老 梧州）做翻译，打通语言这一关，大大方便了顾客 与营 业员业务的交易。

1937年10月左右，广州沦陷，梧州日趋紧张。梧州享达利钟表店采取措施，把店全部搬到柳州小南路口继续营业。从那时起柳州才有一家完完整整经营钟表眼镜商店。在这个时期由于京沪各地沦陷，大多数经商者向湘、桂、黔、滇、川等地发展，柳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外省人来柳经营钟表生意的也逐渐增多。

例如：①1938年间上海亨得利钟表店派葛传麟来柳州开设亨得利钟表店，资金由上海总店调拨，货源也由上海直接调拨。经理、会计、职工亦由上海总店直接任命调配。那时该店资金为20000多元，职工人数门市和修理约十多人 ，地址在小南路中段。

②1941年6月应国本与同乡合伙来柳州庆 云路中段（现柳州大桥左边），开设大西洋钟表店，资金20000多元 ，职工十多人，经理应国本。

③1942年夏季，应国本、王雄夫等合伙在庆云路映山街口对面开设大中华钟表百货店 ，资金约20000多元，职工十多人，经理应国本，副经理王雄夫。

943年初，在大西洋钟表店任职周麟彪退出大西洋钟表店，与人合伙在小南路口（当时真光照相馆隔壁）开设大光明钟表店，资金约五、六千元，职工不到10人，周麟彪自任经理。

在抗日战争后时期，柳州已成为后方的小上海，柳州的各条街道商店林立，市场繁荣，非常热闹，一般认为钟表业好捞钱，因而个人经营钟表又兼修钟表，开设门市部的人真是雨后春笋。如：

由享得利钟表店退职的颜昌生在中山东路开设亨大利钟表眼镜店，主要经营眼镜。

由亨得利钟表店退职的张三益在河南浮桥码头驾鹤东路张驯路口开设徐昌钟表店主营钟表修理，兼卖手表。

湖南人姓刘的（名字忘记）在庆云路中段（现交通队附近）开设太平洋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

李仙传由桂林来柳州在庆云路映山街口开设惠林登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

由大西洋钟表店退职工人乐才新在庆云路中段开设亨大利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后迁坪石营业。

上面所述的是所谓一般大户和中型钟表店，个人摆设修理钟表摊兼售旧表的更多，遍及河南驾鹤路，鱼峰路、谷埠街，河北小南路、庆云路、正南路、东大路、潭中路、培新路下坡等各街道。柳州疏散时大部分向柳州四乡和附近各县躲避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回柳州复业者占少数。

（二）钟表商品货源的变化情况

从1937年到1940年之间，日军尚未南进占领香港以前，

所谓内地较大型的各钟表店所经营的钟、表、眼镜、表带等商品，都是向上海采购的，有的是由上海总店直接调拨的。如亨得利钟表店归上海总店管理，所需货源由总店 直接 调拨。

钟表货源因体积小，是由上海用邮包直接发往 内地 各省、市的。后来战火烧遍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的江 、浙 、皖、赣、闽、粤和沿海一带，并邮递线路长，邮寄时间久，因此邮寄的钟表类包裹，寄香港再转内地。为了加快资金周转，就将包裹先寄香港再寄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市），再由广州湾雇人力挑运至玉林。在玉林找汽车运至柳州。那时候柳州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在广州湾的赤坎均设有坐庄，专搞接货送货事宜。到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进，日军占领了香港，因而我们钟表的货源也告中断了。

其次，在手表的货源上，由于战火的关系，日趋困难，在1940年至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的一年多时间、也有运用飞机走私的。就是由航空公司内部人员与各钟表店联系，由各家写好一张要货清单到香港钟表店去按单要货。每只手表按进货价加10%作为手续费，货到交货交款，每次货款两清，这样搞了一年多，后来日军占领香港，这一方面的货源也断绝了。

（三）经营范围和品种的变化。

从1937年到1944年柳州沦陷前，柳州几家大的钟表店当时经营范围是国产挂钟、座钟；进口小钟（大部分是日本产的），进口手表、挂表、国产眼镜架、眼镜片和眼镜合；进口眼镜片，眼镜架，国产手表皮带，克罗咪手表带，克罗咪

挂表和修理钟表业务。

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在1940年以前还有一些国产的座钟和挂钟出售。后来因运输关系，钟（座钟和挂钟）也逐渐绝迹，主要是运输困难。到1941年以后没有钟卖变为纯粹的表店，只销售表，眼镜、表带了。到1940年 下半 年以后，为了扩大业务，钟表店也兼营自来水笔（即钢笔），所经营之钢笔是国产金星笔，美产的派克金笔和大卫钢笔等，1942年大中华钟表店开业时，又扩大为钟表百货店，它经营手表、眼镜、表带和洋杂百货。货源亦由广州湾进来。但在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以后，钟表货源越来越少，大部分钟表店都是卖存货过日子了。

（四）同行之间的情况

从1937年柳州开始有经营钟表专业店以来，较大的钟表店是亨达利、亨得利、大西洋、大中华四家。在当时只有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时，虽是同行，又是同乡，但同行如敌国，互不往来。从表面上碰面时还打招呼，实际暗中斗争是很激烈的，互找短处，想把对方置于死地而 后快 。如1938年间，上海亨得利钟表店来柳州开设分店，亨达利钟表店为了争夺市场，在培新路增开一家西安亨得利钟表店。为了招牌问题，上海亨得利向柳州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西安亨得利冒上海亨得利招牌，要取消西安亨得利招牌和赔 偿 损失。两家各执一词，请律师大打官司。后来由上海亨达利和亨得利出面调解，西安亨得利改为亨达利而息讼。因此亨达利在柳州培新路和小南路各设一门市部，后来到抗战中期，同乡来柳州经营钟表也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转调和，互

相往来，不分彼此。

（五）柳州沦陷的前后钟表业的变化

1944年9月战火已烧到广西，柳州已呈为紧张状态。从9月初起，柳州各街道居民和商户，都准备向近郊、附近县份和贵州一带逃难。那时柳州的钟表业同行除中小户向近郊和附县份逃难外，其向贵州一带逃难的有亨得利、亨达利、大西洋、大中华、大光明、亨大利、餘昌等钟表店。其中亨达利钟表店当时遣散部分职工外，全店逃至贵州都匀继续营业约三个月。后因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听闻独山大火，又逃至四川泸州市。大西洋钟表店由柳州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华南路十字口继续营业开大上海钟表店；亨得利钟表店逃至贵阳，与贵阳亨得利钟表合并（因直属上海总店管理，贵阳亦属上海总店管理因而合并）；大中华钟表店职工全部遣散；大光明钟表店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山东路十字路口三一商场内摆摊；餘昌钟表店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华南路贵阳戏院摆摊；亨达利钟表店向贵阳方面逃难，后来情况不明。

当时，从柳州向贵州方向逃难是非常悲惨的。一路上日晒雨淋，没有吃，也没有睡。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民党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困难和病老死亡，真是怨声载道。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钟表业同行才逐渐回柳复业。

（六）柳州光复后相继复业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柳州光复。我们经营钟表的同业，相继回柳。在被日寇焚毁废墟上重 振旗鼓 。柳州的庆云路（现在中山中路）亦由那时兴旺起来，外省人

首先来柳州复业的有大中华钟表店的朱道和和中美钟表店的应华章两人，店设在庆云路西段（即映山街对面），两家各有资金2000多元，经营旧表和修理钟表。后来李金鹤由独山搬来与崔柏芳两人在庆云路柳新街口对面开设 亨达利 钟表店，经营旧表眼镜和修理钟表。我父亲许有恒于1946年2月从贵阳来柳州筹备复业，在庆云路西段（现红会医院地址）以亨得利钟表店于当年4月初开业。大光明钟表店 周麟 彪（店设在小南路口）于1946年5月开业。大西洋钟表店应国本（店设在庆云路西段映山街口对面）于1946年6月开业。

那时资金最大的是大西洋钟表店，有10000多元 ，亨得利钟表店有6000多元，大光明钟表店资金有5000多元，亨达利钟表店约3000元左右。当时各店经营商品是经销旧的大挂钟、翻新的瑞士手表、旧庄壳表和原来带到贵阳等地卖剩的一些新瑞士手表，兼营眼镜、表带、钢笔和修理钟表。到1947年初，原来逃难在四川泸州的柳州亨达利钟表老板周庆棠也回柳州复业。当时在柳州经营亨达利钟表店的李金鹤将招牌归还周庆棠，店址顶与周庆棠（与李合伙的崔柏芳进亨达利工作），李金鹤自己另在庆云路近十字街口开美达利钟表店。总之，从1946年起到1948年底左右，专营钟表较大的有大西洋、亨达利、亨得利、大光明、大中华、美达利等外，其他经营旧表和修理钟表的有宝华、中美、桂成、天大等，但资金不多，大约在1000元左右，其余如奇新 、铭记 、利华、陈奇生、维纳斯、胜利等有十五、六家都是个人或两人合做修理钟表的。

（七）解放前夕和解放后钟表业的一些变化

到1949年5月以后，全国临近解放前，我钟表业同行亦由武汉、衡阳、宝庆等地搬迁来柳，其中拥有资金雄厚百年老店的武汉亨达利钟表店二家（陈老章兄弟俩）。太平洋钟表店庄宝钦，衡阳的华盛顿钟表店周永火，大光明钟表店缪成坤，宝庆的亨得利钟表店庄鸿安（他在湖南洪江亦有一家亨得利钟表店）。他们的变化是这样的：

1、武汉亨达利陈志章顶盘原柳州亨达利钟表店店址，继续营业，到柳州解放时将店内全部职工货物搬往昆明，将店址顶与美达利李金鹤营业（五反后搬往南宁营业）。全国解放后，陈志章由昆明搬往武汉复业。

2、武汉太平洋钟表店庄宝钦在柳州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口对面复业，仍开太平洋钟表店。到柳州五反运动结束后，将店结束搬回武汉继续营业，将店址顶与仁信做百货店。

3、衡阳华盛顿钟表店租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对面开设一铺面继续营业，后来合作化高潮时参加合作社。

4、衡阳大光明钟表店在庆云路中段天星巷口以西门子钟表店继续营业。

5、宝庆亨得利钟表店在河南驾鹤东路张肿路口对面以亨大利钟表继续营业，后来合作化高潮时参加合作社。

6、原来亨达利钟表店周庆棠将店址顶与武汉亨达利钟表店后，与亲戚崔大根合伙在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对面开设派克钟表店以崔大根为经理，周本人回原籍宁波。五反后，派克停业，崔亦回宁波，将店址顶与大西洋钟表店营业。

7、解放以后到1951年底，亨得利、大光明、西门子三家为了进一步接受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私人联

营改为联合为水笔行，于1952年1月开始营业。后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企业亏本，到1953年11月初申请，获上级批准于11月底停业，周分顺、缪成坤回宁波。

8、大中华、美华利、西菲利、时代四家于五反后，为了进一步接受改造，四家合营，申请上级批准，于1952年8月改为国泰水笔行，以刘鹏为经理。

由于以上各种的变化，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时，实际经营专业性钟表的只有大西洋一家参加公私合营，其他如天大等和个人钟表修理都转入合作社。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时参加公私合营的是大西洋钟表店应国承 、国泰水笔 行刘鹏、魏汉湘、朱道和、邱明辉、茂昌眼镜店许待安、以及两家摆水笔摊的王绍华、朱子明共八人。

（八）经营的钟表货源和商品式样的变化

在抗战初期，我们经营专业钟表在货源上当初是在上海进货的，品种花色都齐全。如大钟有进口的德国产的肯士林和美最时新的五音极刻打点长挂钟和打点长挂钟，有上海产的昌明钟厂和上海钟厂的新式台钟和一般座钟、挂钟，以及国产闹钟和进口闹钟及小钟等。当初运输畅通，来货容易。到1940年以后，由于物体大，路途远运输困难而断挡。

胜利后，到1949年以前所出售之长挂钟，均系广州翻新之长挂钟和八挂钟；闹钟自1947年至1949年所出售是美国货的大鹏闹钟和英国货的背铃闹钟，数量不多；挂表、手表自1937年至1946年之间所售的手表均系瑞士产 手表占绝 大部分。机件和质量以有细马和粗马两大类。粗马机件较差，其中也 有一种日本产 的精工牌手表 ，美国产的爱尔近 ，华

尔逊、抱乐佛、汉密尔顿等牌子的男女手表，式样多系长方型，圆型占少数。

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有新型的手表进口，货源均改为从广州市采购。在国内来说，是手表更新换代的开始。从那时起，过去长方型的式样，改为圆型的；小三针的改为大三针的；半钢的改为全钢的；没有防水防震的都改为有防水防震的。男女手表式样新颖美观大方，有双日历的，单日历的，全自动的，半自动的，K金壳的，夹金壳的，镀金壳的。女庄过去是长方的，改为方的，园型的，挂表也随顾客的心理由多种逐步转为单一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也可以说现在销售的园型手表也是由那时起更新换代而来，也可以说对表的一种改革吧！

后记

我写这篇钟表业的纪实以1937年—1956年止。前后 是20年，由于我认识肤浅，水平低，所写的内容是粗糙的。结构也是不紧凑的，只是说明在这20年中有这么一回事罢了。

在解放前的旧社会里，人对人之间的表现是唯我是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真是做生意要赚钱，连自己爹娘也要骗三分。

从接触的事物一商品的构造、质量、式样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人的智慧在飞跃，对物质的要求在提高。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